

《宋书》复音词研究

• 万久富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宋书》复音词研究

• 万久富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书》复音词研究 / 万久富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9

ISBN 7-80729-068-4

I. 宋... II. 万... III. 宋书—复音词—研究
IV.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447 号

- 书 名 《宋书》复音词研究
著 者 万久富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9-068-4/H·2
定 价 30.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近三十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并成为汉语史研究中持续上升的热点。人们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详赡的汉语词汇史的建设,期待着一系列在发掘语言事实和理论探讨基础上开展的专书、专题研究;链接汉语史的断裂带,减少学术的空白点,期待着许多扎扎实实的原创性学术专著。万久富博士《〈宋书〉复音词研究》一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完成的。就我所见,《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作者之所以以梁代学者沈约《宋书》纪传中的复音词为研究对象,是因为 51 万多字的《宋书》纪传,具有优质语料的丰富性与鲜活性;其中,拥有 11400 多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复音词,对中古汉语乃至整个汉语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种认识,是作者在汉语史整体研究的观照下,通过对各时期语料进行纵横比较之后得出的,所以《研究》在论及《宋书》纪传的语料价值与复音词特色时,能够言之有物,不是泛泛而谈。

其次,作者第一次深入全面探讨了以《宋书》为代表的中古史书中复音词切分的原则和方法,详细讨论各种结构复音词的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科学性。作者还在广泛参考已有中古语词考释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电子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和历时比较。我

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宋书》复音词的划分和确定,是认真谨慎的,其统计数据和结论也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三,作者在语言理论方面有深厚的素养,又注意开拓研究的思路,并采用新的方法和现代化手段,因而能对《宋书》纪传部分复音词的类型、语义、结构特点做出比较细致的描述和较有深度的论说。《研究》中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如东晋六朝时期是汉语复音词的一个重要的繁殖期和增长点,大量新词新义的产生和消亡是此期词汇发展的突出现象,此期词汇中的“古语词”具有古语和新词的双重性质,等等,都是在认真考察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第四,作者有较深的古文献功底,对语料的时代风格相当敏感,因而能在古语词和新词新义的研究中创获甚丰,其研究成果对古文献整理和辞书编纂工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宋书·王僧达传》“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中华书局校点本在“籍”下逗断,《研究》指出“籍注”是复音词,即在官服役者的户籍簿。又如《宋书·刘义庆传》“足以敦化率民”,《汉语大词典》把其中“率民”误解为“轻浮之民”,《研究》指出“率民”是引导百姓的意思,它不是复音词,而是短语。等等。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研究》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值得推荐的学术力作。

记得万久富博士的《〈宋书〉复音词研究》初稿撰成于2002年4月,跟他同时完成的中古汉语研究论著还有王文晖博士的《〈三国志〉成语研究》,二贤竞爽,令人高兴。在我经常接触的青年学者中,万、王二位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们不但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有独立从事高层次原创性科学研究水平,而且有相当的写作能力。文晖博士的书已于前年出版,现在借久富博士之书即将问世的机会,一并表示祝贺。

吴金华

2006年7月写于复旦大学

引 言

汉语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具有非常悠久而又十分辉煌的历史,它经历了上古、中古、近代这样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成今天的现代汉语。近二十年来,汉语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研究成绩喜人。遗憾的是,尚留有许多的空白等待填补,已有的研究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应该说,要编写一部翔实清晰、点面俱到的汉语史专著,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过去的研究中,在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几个方面进行得最不充分的就是词汇史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吕叔湘先生就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词汇中所占

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和带动下,近二十年来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可贵的成果,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水平。在词汇发展史、词语语义研究的多元化、词的结构、词汇体系、熟语、词汇与训诂、词汇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已全面展开。对各时期专书语词、某类文献语词的考释,成绩尤为突出。就词汇史研究而言,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下册 1956)已作了初步的勾勒,他晚年据以补充修订的《汉语词汇史》^②用更丰富系统的材料说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1988)和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1989)也从不同角度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作了纲要式的说明。向熹《简明汉语史》(中,1993)从词汇发展的角度对不同时期汉语词汇的大致面貌做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可以说,汉语词汇史框架的构建,经过学术界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目前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了,各个时期词汇形貌的勾勒也渐趋丰满。这些进展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仅仅利用这些现有的研究成果去撰写翔实可信、血肉丰满的汉语词汇史专著,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是需要讨论、探索、深化的问题还很多,诸如汉语史分期的细化、汉语词汇结构和语义的历史演变规律、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系统、大量基本词汇的历时更替等等。另一方面,研究的布点不够合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专书专题的研究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所有这些,都亟待有志者的共同努力。

1983年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上,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界的前辈和广大中青年学者提出,在汉语史研究方面,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搞,每一个时代要选择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深入地研究,通过这样扎扎实实的研究,把汉语的历史面貌逐

① 《吕叔湘语文论集》页 28,商务印书馆,1983。

② 1984 年成稿、1990 年出版。

步地搞清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汉语史研究者已做了不少工作,出现了不少专书语言研究的著作,把汉语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自然,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也离不开专书词汇的专题研究。刘叔新先生(1990)认为:“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词汇做共时描写,要揭示词汇从早先时期到晚近时期在组织、构成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规律是不可能的。”^①这样的看法着眼点是高远的。近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了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诸如,陈克炯《〈左传〉复音词初探》(1978)、祝敏彻《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1981)、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1985)、刘诚《〈韩非子〉构词法初探》(1985)、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1985)、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1986)、喻遂生、郭力《〈说文解字〉的复音词》(1987)、李新建《〈搜神记〉复合词研究》(1989)、《〈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1992)、韩慧言《〈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硕士论文,1998)、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1989)、张振德等《〈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魏德胜《〈韩非子〉语言研究》(1995)、钱宗武《今文尚书语言研究》(1996)、王小莘等《〈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1998)、王延栋《〈尚书〉的双音词》(1998)、张能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2000)、梁晓虹《试说〈正法华经〉中的同义复合副词》(2001)、董艳琴《〈战国策〉联合式双音词探析》(2001)等等。这些专书专题研究的特点是,对研究材料作了全面的甚至是穷尽性的调查,以各种类型的统计数字说明语言事实和发展趋势,结论客观可信。这是堪称给人以启发、洗人耳目的一批可贵成果。然而,汉语词汇资料浩繁,传世文献汗牛充栋,以上列举的零星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属于摸索阶段的试验品。汉代以后断代词汇、专书词汇的系统研究还未全面深入,这就必然影响词汇史研究的深度。总之,选择各个阶段有代表性语料价值的专书,多角度、多专题地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通过多部相关文献的比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页9,商务印书馆,1990。

较观照,描绘各时期词汇的具体面貌,找寻汉语词汇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而写出科学而客观的汉语词汇史,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前景光明的必由之路,需要有志者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跋涉。

根据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意见,汉语史的分期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大阶段;细一点分,现代汉语又可分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阶段。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从语法到常用词汇都是相当接近的。近年来随着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分期趋于细密化、科学化,学术界普遍认同,古代汉语还可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古汉语是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东汉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①这一时期汉语词汇和语法都有一些突出特点,总体上呈现出从上古向近代的一种过渡态势。同时在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的发展中又具备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东汉是中古汉语的开端,魏晋南北朝是中古汉语的发展磨合期,中古汉语的成熟期则在中唐。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汉语的发展变化十分关键的时期。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研究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词汇研究方面,成果迭出,成绩斐然。其中,有专以某一类文献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1988)、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1992)、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考释》(1993)、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1997)、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1997)等等;有以某一专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吴金

^① 王云路等《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中古汉语的终结定在唐初。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2000)则定在南北朝。笔者认为吕叔湘先生《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那么中古汉语的结束只能在中唐。加拿大汉学家薄立本认为中古汉语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晚期确定在唐代,这是科学的,这里不再展开。

华《〈三国志〉校诂》(1990)、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1992)、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1993)等等;有对这一时期文献语言或语法词汇问题作全面考释的,如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1990)、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1992)、王云路等《中古汉语语词例释》(1992)、方一新等《中古汉语读本》(1993)等等。另外还有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大量单篇论文。^① 以上这些研究大多以考释语词义为主要内容,爬罗和揭示了大量具有中古时代特色的语词,为进行词汇系统研究提供了材料。至于专书词汇的系统研究、专题研究,进行得还远远不够,除了前面列出的王小莘等《〈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张振德《〈世说新语〉语言研究》中涉及词汇研究外,这方面的面世成果还很有限。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语料价值,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微观上对史书语词的爬梳考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周一良、吴金华、方一新、汪维辉等学者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史书内容丰富,它全面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科学、文化的各个层面,语汇量较之其他类型文献尤为突出,词汇的构成形式和意义内容有系统性;史书的撰写时代一般可以确定,客观上能代表某一时期的词汇系统。史书词汇中的新词新义有着突出的研究价值。^② 我们认为,在利用史书进行个别语词考释的同时,将某一部有代表性的史书的词汇面貌做系统性的描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这种个案研究的深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基于这一认识,笔者选择《宋书》作为南北朝史书的一个代表作品,并考虑到南北朝时期复音词迅速发展这一词汇史上的显著特点,以《宋书》复音词研究为突破口,并与先

① 可参考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页368—401,商务印书馆,2000。

② 可参考方一新、王云路《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一文,见《中古汉语研究》页143—156。

秦和现代汉语复音词做适当的历时比较,旨在藉此探求中古复音词发展的特征和内在规律,从而确定中古汉语复音词在汉语词汇发展中的位置。这项研究应该是可行而有益的。希望这一尝试能取得学术界的认同,达到预期的目标。

目 录

序	吴金华(1)
引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宋书》的语料价值	(1)
第二节 《宋书》复音词研究的意义	(7)
第三节 《宋书》复音词研究的方法	(18)
第四节 六朝时期汉语词复音化的原因	(21)
第五节 《宋书》复音词的切分	(27)
第二章 《宋书》复音词的结构	(59)
第一节 结构类型的探讨	(59)
第二节 单纯复音词的结构	(63)
第三节 合成复音词的结构	(69)

第四节 《宋书》复音词结构的特点	(99)
第三章 《宋书》复音词的语义特点	(107)
第一节 《宋书》复音词的聚合关系	(108)
第二节 《宋书》复音词的组合关系	(125)
第三节 《宋书》复音词中的古语词	(128)
第四节 《宋书》复音词中的兼类词	(142)
第四章 《宋书》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	(148)
第一节 新词新义研究述评	(148)
第二节 《宋书》复音词新词新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154)
第三节 《宋书》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的构成	(159)
第四节 《宋书》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例释	(169)
第五章 《宋书》联合式同素异序复合词	(191)
第一节 联合式同素异序复合词研究的意义	(192)
第二节 《宋书》联合式同素异序复合词历时考察	(196)
第三节 联合式同素异序复合词发展的内在机理	(231)
第六章 《宋书》中的复音虚词	(236)
第一节 词汇研究与语法研究的关系	(237)
第二节 《宋书》中的复音虚词例释	(240)
第三节 《宋书》复音虚词的研究价值	(274)
结 语	(275)
参考文献	(280)
附录:《宋书》复音词总目	(287)
后 记	(37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宋书》的语料价值

一、沈约与《宋书》的撰写

沈约(441——513),字休文,六朝梁吴兴武康人。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仕至五兵尚书、国子祭酒,梁时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祖籍江南,是吴兴士族,沈约一门,仕宦显赫,在南朝三代影响很大。《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称:“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梁书·沈约传》称:“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沈约)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迁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

长史,黄门侍郎。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遊焉,当世号为得人。”《宋书·自序》所述更为详细。

沈约的著作颇丰,据《隋书·经籍志》、《梁书》卷13《沈约传》记载,沈约撰《晋书》111卷、《宋书》100卷、《高祖纪》14卷、《齐纪》20卷、《新定官品》20卷、《宋世文章志》2卷、《俗说》5卷、《杂说》2卷、《袖中卷》2卷、《袖中略集》1卷、《珠丛》1卷、《子钞》15卷、《迺言》10卷、《谥法》10卷、《四声》1卷^①、《沈约集》101卷、《集钞》10卷、《梁武连珠》1卷、《宋文章志》30卷等。今天仅存《宋书》100卷和文集9卷,^②其他如《晋史》、《齐纪》、《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南齐永明五年(487),时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的沈约奉诏修撰《宋书》。他依据何承天、徐爱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③历时近一年,于永明六年(488)二月完成纪传70卷。直至梁武帝即位(502)以后,100卷《宋书》的修撰才最终完成。

二、《宋书》的语料特点

整体看来,沈约世居江左,又是文史大家,其所撰《宋书》应该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基本可以反映六朝语言的真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以来南方话的某些特点。《宋书》的语料价值是至为珍贵的。首先来看一下《宋书》语料的时代属性。史书语料年代的判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应该根据史书作者的生存年代确定,还是应该根据史书所记载内容的年代来确定呢?方一新等学者对此做过较深入的研究。下面引用《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2000)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来作参考:

① 《梁书》卷13《沈约传》作《四声谱》。

② 《四部丛刊》史部收《竹书纪年》系沈约附注。

③ 何承天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始修宋史,草立纪传。徐爱大明六年(462)据以修成“国史”(《隋书·经籍志》称“徐爱《宋书》六十五卷”)。

我们认为,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史书中的材料应该分为两大类,即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它们作为语料的年代是有区别的。……史书中的原始资料,是指正文中原文引录的当朝文献……它们虽然也还有史书作者加工润饰、以意裁剪的可能性,但原则上应可认定为当朝人的作品。把这部分资料一概当作史书成书时代的资料来对待,当有不妥。原始资料以外的部分都属于其他资料,包括记事和记言两大类。史书中的叙事评赞语属于记事成分。作者在记叙史实时肯定参考、采用了许多前代史料,但是这种参考、采用绝非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一定的整理沙汰、修改加工后才写入史书的,理应看作是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史书中的人物对话和言论属于记言成分。这部分内容的语言相对浅显,靠近生活,很难排除作者增删改易乃至再创作的可能性。……记言部分内容从原则上讲应该视同为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在未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把记言或记事材料当作史书所记载年代的语料来使用,是值得商讨的。^①

这些看法总体说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认为史书的语料时代要根据某部史书的具体编写情况,以及史书的语料类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来看看《宋书》语料的类型特征,史书尤其是正史,内容十分丰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及,加上史书撰写的滞后性,史书可在纵横两方面涵括了某一时期的语言特征。《宋书》的语料可以分为以下八种类型:(1)奏疏、文书;(2)诏令、手敕;(3)信札、家书;(4)文章、诗歌;(5)谣谚;(6)人物对话;(7)史家述语;(8)论赞。其中(1)、(2)、(3)、(4)属于原始材料,应视为刘宋语料。如:《始安王休仁传》载宋明帝《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孝建九年举才表》、《谢庄传》载《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自陈牋》、《谢灵运传》载《山居赋》《撰征赋》等就属于此类。(5)、(6)以及(7)、(8)中的一部分,情况最为复杂,有

^① 《中古汉语研究》页147—148。

的可能是实录谣谚、人物对话,那就应视为刘宋语料;有的内容为转引、转载,甚至系再创作,难免有改易的成分,其时代属性要作具体分析。(7)、(8)中的一部分可能是沈约抄袭何承天、徐爱等人《宋书》,那就该看作刘宋语料。如果是沈约新作,那么在时间上就要晚些,有的甚至可以看作是萧梁时代的语料。另外,我们知道正史的撰写,基本采用正统文言,敕令、文书固然典型,即便是奏疏、信札亦存在雅俗之别。人物对话也有场合的差别,这些情况在一般史书中已有反映,《宋书》作为六朝人记六朝事,六朝人录六朝言的一部正史,语料的雅俗文白之分就显得更为突出。沈约时代,是时文盛行,古文沉寂的时代,^①因而他既继承传统的史家笔法,又直录了大量口语特征鲜明的原始材料。清郝懿行《宋琐语·弁言》说:“沈约文士,其为《宋书》,虽甚淹赡,亦多浮杂,往往喜谈菟琐,摭摭隐怪,时同小说家言,殊失国史之体,然叙事华妍,韵情朗畅,自一代史才也。”这段话虽是从正史取材的角度评说其内容的得失,也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书》语料的丰富性和鲜活的特色。沈约在叙事语中也渗入了大量具有时代风格和南方特点的语词。如:骈偶特征所造成联合式复音词的大量产生;以“阿”为词头的双音词可以看成是当时南方语言词汇的突出一点。

另外,我们可以根据《宋书》的成书过程,来对《宋书》不同部分内容的时代属性作一个大致的推断。《宋书·自序》载沈约《上宋书表》称: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爱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

① 参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